

# 德文版马克思传记中译本梳理

■周国忠

马克思有“千年思想家之首”的美誉。学界对马克思传记的研究大都聚焦于传记著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从版本学的角度给予关注的却颇为欠缺。

德语是马克思的母语,德文版马克思传记大致有三类:一是以梅林(Franz Mehring, 1846—1919)为代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创作的传记;二是以政治中立、学院派立场创作的马克思传记,如滕尼斯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1921年);三是以精神分析法创作的马克思传记,如施瓦茨希尔德的《红色普鲁士人: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传奇》(1947年)等。自民国以降,德国学者撰写的马克思传记已有多种中译本,有的译本在出版说明方面还出现一些疏漏,有待辨析。现对德文版马克思传记中译本之演变予以梳理,以绘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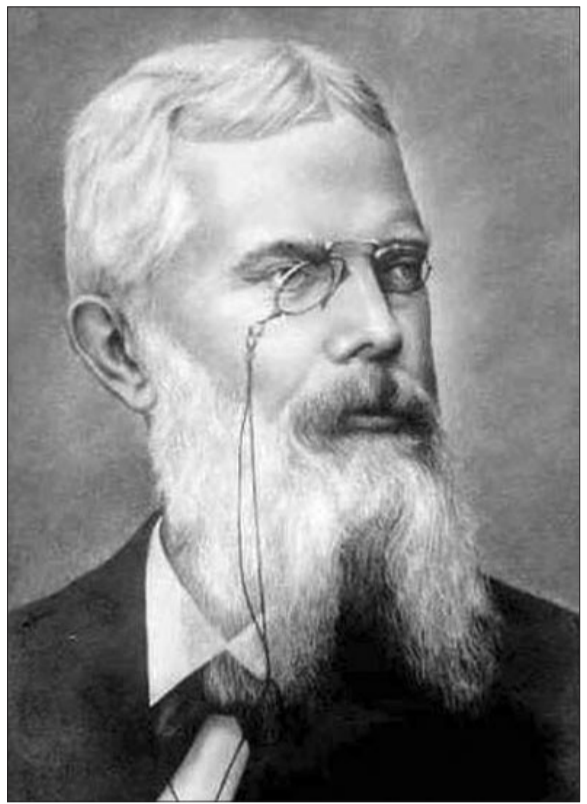
## 贝尔的《马克思传及其学说》

民国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大量地涌向中国,参与改变或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是西学中译的一座高峰。在那个各种社会思潮风云激荡的年代,源自德国的马克思传记传入中国就成为必然。

1930年,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推出了德国史学家贝尔(Max Beer, 1864—1943)所著的《马克思传及其学说》(易炳译)。该书根据T. C. Partington和H. J. Stenning的英译本转译,全书分为绪论、父母与朋友、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时期、狂风暴雨的年代与命运的变迁、马克思主义体系、结论等六部分。该书以简练的篇幅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和体系作了勾勒,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受篇幅所限,贝尔对马克思的社会活动背景、革命实践、生活圈子、情感世界却很少提及。从严格意义上说,它还不是一部完整的马克思全传。

贝尔的人生跨越两个世纪,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他的另一代表作《社会斗争通史》(神州国光社,1930年)由翻译家叶启芳从英文版转译而来。叶教授在前言《译者小序》中写道:“至于其著作,则除本书社会斗争通史之外,听说还有马克思(笔者注:民国时尚未通译为‘马克思’)生平及教训与英国社会主义史。我的所知甚少,所以便四处向友人通信,务期集会所见,以便成一篇详细的柏耳小传。”言下之意,叶先生很想把贝尔的著作及生平尽可能详尽地推介给读者,却苦于缺少资料而作罢。

易炳的译本也许能弥补叶先生的一点遗憾,但易炳译本也未介绍作者的简历,显然也是资料缺乏的缘故。但不管怎样,易炳译本为民国时期的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阅读马克思传记的窗户。



梅林

## 梅林的《马克思传》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文化出版领域的把控。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生活书店决定恢复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基于安全考虑,生活书店改名“骆驼书店”,继续从事进步的出版事业。著名翻译家、生活书店创始人之一罗稷南(1898—1971)在“孤岛时期”翻译的《马克思传》(梅林著)便于1945年11月由骆驼书店率先推出。梅林是德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他集数十年之功撰写的《马克思传》是第一本全面展示马克思光辉一生的传记巨作,该书问世后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全球传播。关于马克思的传记,列宁曾经推荐过梅林的《马克思传》。该书有两种俄文译本,分别于1920年、1935年推出。该书的中译本初版是罗稷南根据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的《Karl Marx, The story of His life》(《卡尔·马克思——他的生活的故事》)1936年第2版转译的。初译本的封面题名为《马克思传》。白底黑字,素面朝天。把“Karl Marx”音译为“马克思”,版权页上只注明出版者骆驼书店,未标明出版地,这或许是为了躲避国民党政府的耳目,减少发行可能遇到的麻烦。这是初译本的一个显著特点。之后,该译本于1948年3月至1949年2月间累计再版3次,印数11,000册。再版时版权页上注明“哈尔滨印造”。这意味着哈尔滨的文化出版氛围已相对明朗,骆驼书店的出版活动基本可控。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

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梅林的《马克思传》作为权威读本在新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三联书店于1950年1月、1950年12月、1956年5月、2012年10月相继推出该传记的罗稷南译本,书名取通用译名《马克思传》。期间因1956年1月起,祖国大陆报刊书籍普遍推行简体字横排,《马克思传》中译本自1956年起也随之以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大大便利了阅读与传播。

要探讨版本价值,就需要尤为注意版权页上出版时间的标注。图书的编辑出版或多或少总会带上时代的烙印,这也是人们在引用参考文献时必须标明出处和出版时间的依据之一。笔者在阅读北京大学萧灼基教授的《马克思传》时,对萧老在《自序》中一段回顾自己创作动因的话记忆犹新。他说:“我还在读研究生时,便产生了要写一部关于马克思个人传记的想法,以借此向伟大的革命导师致敬。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初,当弗·梅林的《马克思传》中文版成功问世之后,我的这一想法更加坚定——要写一部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传》。”言下之意,梅林写的传记对萧老的影响很大,但萧老可能是没有看到民国时期的中译本,便误以为该传记的中译本问世于20世纪50年代初,这是一处明显的“硬伤”,把中译本的问世时间推迟了好几年。萧老已过世,他是我所敬仰的大家。他的《马克思传》如有再版机会,此处“硬伤”应有所辨析,以免以讹传讹。

梅林的《马克思传》除了罗稷南译本外,还有樊集译本。樊集译本分2册,第一版由三联书店于



梅林的《马克思传》德文版书影

1965年5月推出,共831页。该译本在《出版者说明》中写道:“本书是根据1957年出版的俄文译本转译的。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狄茨出版社1960年德文原本、纽约科维奇与弗里德出版社1953年英文译本、东京大月书店1953年日文译本和三联书店1953年中文译本(罗稷南译)。”笔者据此查检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福建省高校图书馆Fun link文献提供系统,均未查到三联书店1953年中文译本(罗稷南译)。1956年三联书店罗稷南译本的版权页及罗稷南在

《译后记》回顾中也未提及1953年有过再版。据此,笔者判断,樊集参考的三联书店罗稷南译本可能是指1956年的版本,因为1953年根本就没有出版的记录。樊集在《出版者说明》中还写道:“《马克思传》是梅林的主要著作之一,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他逝世以后(1919年)才出版。”但对比罗稷南译本(1950年12月三联书店出版),该书《英译者弁言》第4页却写道:“现在呈献于英语读者之前的这马克思传是梅林的著作的顶峰。这书的初版在1918年才发行于德国……连续再版了六七次,销售了好几万部。”梅林在《著者自序》的文后落款时间是1918年3月。1954年6月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7卷上有一篇“梅林传略”,对于梅林这个人和他的这一著作作了评价:“这部著作(初版于1918年,俄文译本则出版于1920年)是梅林在长久岁月中收集、研究、校印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遗著的总结。”据此种种,梅林的这一著作初版界定于1918年应该更可信。“文革”期间,罗稷南被戴上“中国的爱伦堡”的帽子,受到错误的批判。他的译本在他1979年平反前当然不可能再版了。1972年12月,人民出版社(当时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重印了梅林的《马克思传》(选取樊集译本)。读者若以樊集译本中的《出版者说明》为参考,便误以为梅林的《马克思传》问世于梅林去世之后,这恐怕是一处“硬伤”,对著者梅林也欠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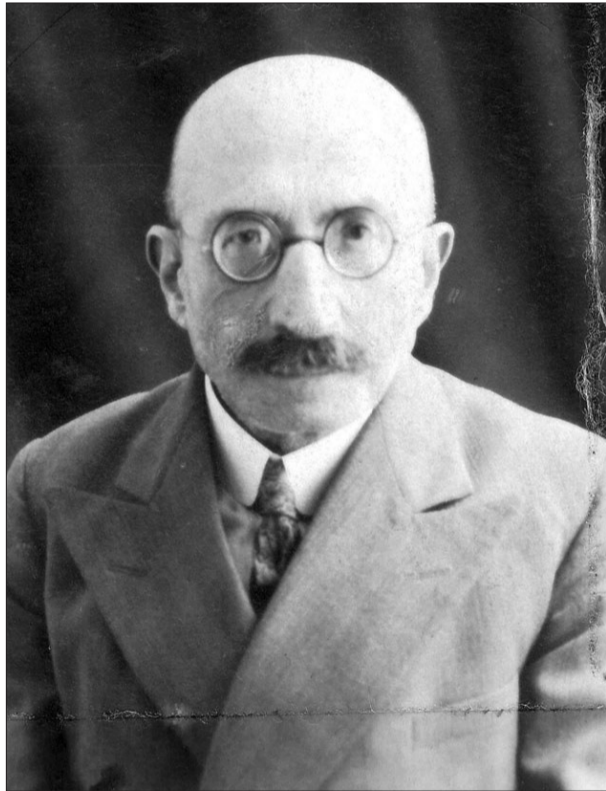
## 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著的《马克思传》

关于马克思传记,中国读者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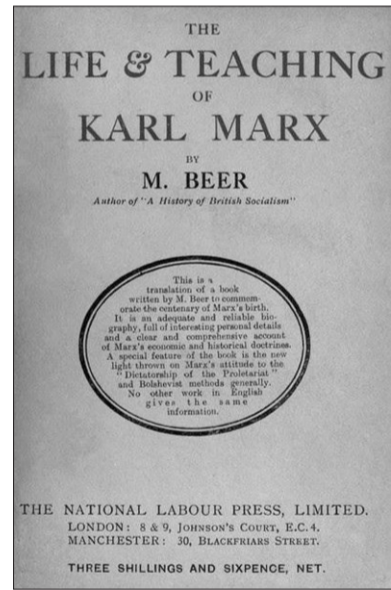
前民主德国马克思主义史专家格姆科夫(Heinrich Gemkow, 1928—2017)的著述也颇为关注。1978年12月,格姆科夫等著的《马克思传》中译本率先由三联书店推出,印数达20万册。该书是译者易廷镇、侯焕良根据柏林狄茨出版社1967年德文版译出的。之后,三联书店多次重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颇为流行。2000年5月人民出版社也推出易廷镇、侯焕良的译本,2005年4月再次印刷。该书在封面内页上如是推介:“这部传记是一本科学普及读物。全书阐述了马克思的革命实践和科学研究活动,包括其各个时期的代表著作,生动地描述了他与恩格斯的真挚友谊,他的家庭和对子女的教育,以及支援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本书史料丰富,情节生动,图文并茂,译笔流畅,是广大读者了解和学习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一部好书。”从多次重印的数量及社会反响看,这个推介还是恰当的。

格姆科夫为青少年写的另一本通俗读物《我们的一生——马克思恩格斯传记》的中译本则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推出。该书是译者舒昌善根据柏林狄茨出版社1981年德文版译出的。书名取意于恩格斯晚年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没有虚度一生。”该书除了概述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活动和著述外,也把他们的日常生活、亲情、友情、爱情轶事穿插其中,读来颇有情趣。

阅读伟人传记,感悟思想光华。马克思已远去,但他的思想却是不朽的!



贝尔



《马克思传及其学说》英文版书影

# 传统文化与少先队教育活动的深度融合

■王彬

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委员邱孝慈先生在其新作《我们需要怎样的节气文化》中,以二十四节气诗词为经,以创新开展少先队教育实践活动为纬,把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与新时代关心下一代教育工作相结合,为广大基层辅导员创新少先队教育活动,提供了可操作性指导、完善的活动设计和整体解决方案。

本书与通常的课程活动设计不同,作者在呈现活动设计方案之前,以节气经典诗词为脉络,向读者完整展现了二十四节气的节气、物候、民俗等丰富内涵。这样的安排,能够让读者对我国传统节气文化有一个深入了解。以此为基础,逐步呈现“我的节气我作主”系列主题活动,便可以让读者深刻领会融合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少先队教育活动在竖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方面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在本书中将二十四节气

作为切入点,并将传统诗词作为承载展现节气底蕴的载体主要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对天文、气候、物候等做了长期观察与探索后总结出的成果,可以指导人们的农事耕作和生活起居。二十四节气虽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但其背后蕴藏着丰富的中华民族传统习俗与文化底蕴,体现着劳动人民尊崇生命、热爱生活、吃苦耐劳的良好品质,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我国古代诗词文字凝练而优美,能够集中反映某个历史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或是借助景物抒发情感。古代文人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诗词资源,其中就有不少与二十四节气有关。作者在本书中搜集的二十四节气诗词,有描绘劳动人民从事农事活动,体现其朴实善良、吃苦耐劳优良品质的;有描写自然景色、天地万物,寄情于

景、借物抒怀的;有描写四季轮转、百姓生活,表现民风习俗的。因此,将二十四节气作为少先队教育活动与传统文化教育结合的切入点,并将传统诗词作为承载展现节气底蕴的载体,既可以提升活动的实践性,亦能拓展传统文化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实施途径,提升教育效果。

在少先队教育活动中,少先队员应是活动主体,辅导员则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但在一线实践过程中,辅导员与队员的角色错位现象比比皆是,最明显的情况便是辅导员在活动中占据主导位置,“包办”活动的设计、组织、开展等各方面工作,队员则作为“心不在焉”的执行人,教学效果低下。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因素有许多,较为突出的有:辅导员缺乏将队员作为主体的意识,活动设计思维僵化,活动价值认识不清等。本书作者在活动设计板块“我的节气

我作主”中充分考虑到了上述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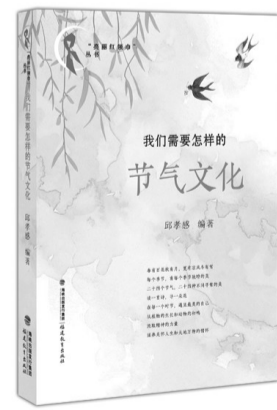
首先,本书活动设计明确了辅导员、家长志愿者、队员等的角色定位。在教育活动的各个阶段,均应凸显队员的主体性,这里既要求辅导员具备身为活动引导者的觉悟,亦有激发学生自身主体意识的要求。从本书“我的节气我作主”板块中的活动案例可以看出,在确定二十四节气中的某一项作为活动的方向后,辅导员便可充分发挥队员的主体性,让他们详细阐述自己对节气的想法,策划活动主题,细化活动内容、组织分工、开展活动。活动过程中,辅导员还需结合本书各小节前半部分对节气文化底蕴的阐述,根据队员的实际情况作出预设,注意引导的时机与方式,避免队员产生过度依赖感,使教育活动的实效性打折扣。

其次,本书的活动设计形式多样,活动价值清晰。作者有着

50多年的少先队工作经验,对少先队教育活动的价值,对各学段队员的心智发展情况、知识储备情况等都有清晰认知。“我的节气我作主”板块中,作者围绕节气文化,结合少先队教育活动对队员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要求,呈现了大量主题清晰、形式多样的内容,供辅导员参考。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的时代新人成为教育事业的新的挑战。正如前文所说,少先队教育活动,既要具备实践与体验特色,又要突出科学性、时代性和实效性,作者在本书“我的节气我作主”板块中便重点关注了这些要素。

在活动设计中,作者借鉴了时下STEAM教学中的项目化学习模式(PBL)。在体现队员主体性的前提下,根据节气特点(气候、民俗等),协助队员做好活动项目规划,鼓励队员们运用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领域的知



《我们需要怎样的节气文化》,邱孝慈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定价66.00元

识,较好地完成项目目标。

本书以传统诗词为桨,将实践经验作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二十四节气与少先队教育活动深度融合,实现了少先队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共同发展的双赢目标。相信少先队辅导员通过阅读本书,能够提升到理论与实际操作方面的有效提升,较好地开展少先队教育活动。